

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院士

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以东道主的身份热情欢迎各位学者光临南京大学。同时，我在此十分荣幸地宣布，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

这次会议正式代表有 130 多位 学者们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此外 还有国际上的同行 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韩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这么多的代表不辞严寒来到南京，共聚一堂，这是南京大学的荣幸。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兴中会成立一百周年。兴中会在 1894 年成立之初 便提出了“ 振兴中华 ”这一个响亮的口号，它道出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信心与理想。因此，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振兴中华一百年 ”。

中国近百年史是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国的喜怒哀乐已经不仅仅只影响自己 影响东亚 而且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现在，整个世界都密切关注着中国，中外学者们为了真正地地理

解急速变化中的中国，在不断地研究和回顾它这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华民国史是中国近百年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从 1912 年到 1949 年，它只存在了短短的 30 多年，但是这段历史的内涵却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择要而言，以辛亥革命为开端，中国开始创立和实验共和民主制度；近代民族工业开始起步和发展；近代政治、文化、教育、产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制度体系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抗外来侵略和恢复国家主权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等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陆史学界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从 70 年代初期才开始的，尽管民国史的研究起步很晚，它的发展却是非常迅速的。首先是因为它拥有众多乐此不疲的研究人员，以及丰富的资料。其次，民国史研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公众对民国史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从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民国时期内容为素材的作品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第三，则要归功于与国际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增加。迄今为止，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举行了两次。1984 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的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第二次是在 1987 年，地点也是在南京，这一次是第三次，也是代表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应该说，民国史已经成为历史学中的热点。可以想见民国史研究在未来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南京大学以前一直支持民国史的研究，今后仍将如此。这一次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讨论会，目的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研究心得的机会和场所。希望能够通

过这次会议 促进各位学者之间的友谊和自由交流。今后 大家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 通过不同的研究课题 携手合作 共同将民国史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最后，预祝这次讨论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顾问

陈清坤先生贺词

曲校长、张主任、各位女士、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对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世界各地尊贵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以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我感到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实业的振兴，还需要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振奋，所以我乐意尽自己的可能做一点事情。当我知道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计划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便与他联系，为中心的成立尽了自己的一点心力，这也是我投资公益事业计划之一。中心建立后，在曲校长的关心下，在包括出席今天大会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做了不少工作。我与张教授的合作非常愉快，我对此非常的满意。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顺利召开，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许多仁人志士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为这一共同的目标努力着、奋斗着。我想这次会议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一堂 共同探讨振兴中华的历史轨迹，
回顾过去，昭示未来，是很有意义的。

会议结束之际，新的一年即将到来。预祝各位尊贵的宾
客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第三次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成功口占

杨光彦

（1994年12月20日）

学界同仁四方来，
知行楼内荟俊才。
切磋民国诸史事，
友谊之花久长开。

（作者为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张海鹏研究员 贺 词

主席、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各位聚集一堂，在美丽的南京大学校园里隆重举行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本人有幸接受邀请前来聆听各位的高论。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因为民国的诞生而告终结。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胜利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发生在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引人瞩目的新事物、新变化也都出现在民国时期。民国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历史学家去努力。

从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推翻北洋军阀；从国共分裂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历史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留下了一份共同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去总结，去研究。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诞生一百

周年。一百年以前 孙先生第一次提出“ 振兴中华 ”呼唤千万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浴血奋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责任携手合作，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终身的振兴中华的大目标而努力。我们治史的人首先要担起这个责任。我想，司马迁所说“ 书往事，思来者 ”、“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司马光所谓“ 鉴前世之兴衰 考古今之得失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组织地推动民国史的研究在大陆起步较晚。虽然早在 50 年代就曾经提出过民国史研究的任务 并在资料准备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 但是直到文革当中的 1972 年才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了民国史研究组，民国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才开始创立。1978 年以后，民国史研究在大陆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的注意，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研究成果迭出，几乎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领域之一。民国史研究在海外和台湾地区近年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次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对民国史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民国史研究繁荣兴旺的一个标志。

民国史研究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时间毕竟不算太长，还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我们去开拓，还有大量的史料等待我们去发掘，还有许多认识需要我们去深化。对于民国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看法，大陆学者和台湾以及海外学者之间都有不尽一致之处，这在学术上是非常正常的。因此需要大家相互交流探讨，彼此沟通切磋。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和海外的学者同我们一起多多交流 共同推动民国史研究向前发展。参加这次大会的学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我想各位都会和我一样，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我尤其对来自于台湾

和来自于海外的学者们寄予期望，相信他们一定会对本次讨论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大家知道，在台北阳明山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珍藏有大量珍贵的民国史档案史料，海内外学者中能够直接利用这批档案的还不多。我 1992 年 5 月在台北接受《联合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呼吁开放大溪档案。我曾经在李云汉主任委员的陪同下，隔着玻璃参观过这批档案中很少的一部分。同行的台湾学者告诉我，他们也无缘得见这批珍贵史料。我借此机会再一次呼吁开放大溪档案。希望有很多的台湾学者去利用它，也希望有大陆的学者去利用它。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集中收藏民国史档案的地方，迄今为止，它广泛地接待了来自于海内外的学者。台湾的档案收藏部门是否也能够为推动两岸的学术交流做出一点贡献呢？

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聚集了相当多的研究人才，还成立了我们国内首家民国史研究中心，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这一次南大的同行们为推动民国史的研究，召开此次国际会议付出了很多辛劳，在此我以同行的身份，并且代表在座诸位学者向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向为会议提供周到服务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被国内同行学者视为国内民国史研究的中心 我们是很惭愧的 我们自知能力有限 水平不高，贡献太少，距离学术界的期望甚远。在学术界朋友的督促和鞭策下，我们应当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以报答朋友们的厚爱。目前，鄙所民国史研究室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大事记和中华民国人物传，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工程，全部完成以后将要出版 60 卷 80

册，2500 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过半。我们希望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在工作中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我们所其它一些研究室也都承担着与民国史研究有关的工作任务，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成果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注意和批评。我们还有一个专门发表研究抗战时期成果的刊物，叫《抗日战争研究》，也希望在座各位赐稿。

女士们、先生们，这次民国史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是有特殊意义的。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 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 民国史研究可以有新的进展，可以展现新的成绩。所以我衷心希望民国史学界的朋友们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再次祝愿大会取得成功，祝愿所有与会的外国学者、台湾学者和来自大陆各地的学者在南京生活愉快。

谢谢各位。

中研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张玉法院士 贺 词

主席张宪文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个人有机会参加第三次中华民国史研讨会，觉得非常高兴。第一、第二次没有来得及参加，因为第一次时是不可能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国史馆馆长收到大会的一封邀请信，他很高兴，但是他说：“可惜我不能去。”因为那时两岸还没有开放。不管怎样，我想台湾学术界有机会和大家——世界各地学者，包括两岸的学者——共同坐在一起讨论中华民国史，大概这是第一次。我们台湾学者能够亲自参加的，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陈三井所长、沈怀玉小姐等。

根据我的了解，民国史实际上和国民革命史一样长。刚刚几位贵宾介绍了这次讨论会是要纪念兴中会成立一百周年。不久前台湾史学界也开了一个纪念国民党建党一百周年的会议，参加学者非常多。我想，1894年可以说是中国转变的很重要的年份。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检讨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以及这些转变。

民国史的研究，据我的了解，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有

一百年的历史，兴中会成立之后到现在，差不多就有人研究这段历史，已经研究了八九十年。在这八九十年当中，当然早期的研究都是相当初步的，也就是说做了一点初步的资料整理。

我记得大概在中华民国创立的那一年——1912年，谷钟秀就写过一部《中华民国开国史》这是我了解的最早的最完整的一本。虽然比较薄，但还是叫《中华民国开国史》。早期的研究偏重政治史、革命史。后来的研究大概到30年代，就有人已经开始研究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一般说起来，我的印象是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民国史的著作非常之多，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起来，大多数的书还够不上很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过，有一些史料非常宝贵。

学者大量地从事民国史的研究，在我看来，是从1950年代到现在。大概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差不多20年的时间当中，我认为辛亥革命的研究最有成就。不仅两岸的学者研究辛亥革命，而且国外的学者也有很多研究辛亥革命，这是早期20年。

大概从1970年代以后，民国史研究才比较开阔一点，也就是研究范围广一点，而且投入的学者越来越多。投入多的原因或者说大家有兴趣研究民国史的原因，我在这里提出三点：

第一个因素就是大陆的学者。我们非常感谢李新先生。我的印象大概是在1972年左右，我们在台湾得到一个情报（那个时候叫情报）说是李新先生等大陆的学者要修中华民国史。我们听到之后觉得蛮紧张的，我们在台湾的学者还没有想到要替中华民国修史，大陆学者却要来修了。我们就觉

得责任没有尽到，我们想，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修。所以这一个对台湾学术界的刺激，使我们非常严肃地来研究中华民国史。从那开始，我们两岸都在进行民国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台湾修的叫《中华民国建国史》已经出版了一套大概加起来将近十七八本。大陆地区学者修的民国史虽然还没有全部出版，但是已经出版了很多的专著，还有资料集、传记。这个可以说是对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在这一种研究环境、风潮之下，台湾大概是在 1973 年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列为大专学校的必修课程。很多的老师为了要教书，他就做一些民国史的研究。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修中国现代史。实际上，大家晓得，在台湾大学教的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华民国史，甚至于就是国民革命史。早期可以说非常狭窄的，现在是比较宽阔一点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非常感谢世界各国的学者。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对近代史的研究非常有兴趣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来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相信我们两岸的学者都非常感谢国外的学者，我们在史料处理上，在研究方式上，向他们学了很多很多，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美国的学者们。最近几年特别为中华民国史研究办了一个杂志——*Republican China*。这可以说是美国学术界正式把民国史作为一个研究范围的一种倡导。

台湾有一个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在最初成立的十多年，每个月举行一次座谈会，请专家学者来演讲，然后讨论。座谈会的论文记录已经出版了十多本。

最近，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从这个研

究中心成立起来之后，比较起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就很小了，不仅很小，而且最近几年活动不多，几乎已经停止了活动。目前看起来，大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基地就像刚才校长先生所说的就在南京大学了。所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才能够号召世界各地的学者到这里来开会，共同讨论民国史的问题。

谢谢各位。

《实业计划》与中国经济

茅家琦 杨德才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 孜孜不忘振兴中国经济 并认为“中国存亡之关键 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1]进行经济建设，应采取什么样经济制度？资金又如何解决？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及其他论著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 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实业建设应采取混合经济制度

孙中山写道：“中国实业之开发 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2]他明确地提出了采取混合经济制度发展中国的实业。

关于私营经济 孙中山指出了它所经营的范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 由国家奖励 而以法律保护之。”^[3]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

* 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凡是适宜于私营的企业，概归私营；二是对私营经济采取国家奖励和保护的政策。他还具体提出改善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 他说：“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 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 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4]

孙中山主张奖励、保护私营经济的同时，又提出节制私营经济的主张。他并不主张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自由放任的发展。孙中山提出了如下几条节制私营资本的措施：

（一）从经营的范围上加以限制。具有独占性质或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不允许私人资本经营而由国家经营。

（二）国家设机构管理私营企业。他说：“对于私人之经营矿产者 既可以资鼓励 而工业之基础亦可因之以成立。但机厂之设立 须依各区之需要 由专门家以定其规模之大小，而设中央机关以管理之。”^[5]

（三）国家采取累进税率向资本家征收直接税。孙中山认为：“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 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6]“行这种方法 就是累进税率 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7]

（四）国家有权限制收回或“择其优者 用款购买”私人企业，以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和预防垄断的产生。

关于国家经营的企业的范围，孙中山说：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 应由国家经营之。”^[8]他还规定“凡天然之富源 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

用。^[9]他说,像交通、邮电等事业“;如果不用政府办,要用私人办,不是私人的财力不足,就是垄断的阻力极大。”^[10]

孙中山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要是从防止出现私人垄断资本,造成社会不公为出发点的,因此,他提出了他认为“积极”的办法,即由国家大资本代替私人大资本“;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11]从而带动并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国营经济包括两种经营方式,即中央经营与地方经营。他非常重视地方经营的经济。他认为,只有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地方实力,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前进。因而,他主张地方经济的侧重点应放在各县,要各县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将土地收归公有,兴办企业,做到自治,满足人民物质文化多方面需要。他在《建国大纲》中指出“;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12]他还提出,如果“各县之天然富源以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13]

孙中山提出的混合经济制度,还包括中外合资经济。当然,从中资方面看,与外资合作的也不外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两种。在《中国人之直言》中,孙中山说“;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美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才。”并主张“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14]这是很有意思的

想。

综上所述，可见孙中山关于以混合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实业的思想，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他不仅紧紧着眼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且又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考察，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这是孙中山用其毕生心血探索出来的一条发展中国实业振兴中国经济的道路。

二、实业建设的资金来源：借用外资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国，振兴实业的资金怎样获得呢？孙中山认为，要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人才的方针。他说：“我们就是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的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5]还说：“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16]在他看来，利用外资以解决中国实业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事。

然而，在当时，孙中山利用外资的思想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为了说服那些反对利用外资的人，孙中山多次在演讲中论证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在归国途中曾作过一个估计，认为“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裕如。”^[17]如此巨款，从何而出？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打算以军需的名义发行公债，以筹集国内资金，定额为一万万元，结果认购者寥寥，实际发行仅 737 万元。^[18]孙中山意识到：“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